

张天翼 要写得更深切 更开阔

■ 记者 张洁

从当年以网名、笔名“纳兰妙殊”创作出一系列怪诞、幽暗、迷离、瑰丽的文字，到用回本名张天翼后出版《如雪如山》《鱼水》等小说，这位天津籍女作家以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杀入文坛。读者也说，读她的小说“有一种久违的被紧紧抱住的感觉”。近几年，她的写作开始聚焦容易被忽视的普通人，尤其是沉默的女性群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谈到成长、写作、女性、家庭等话题，也回忆了给予她无尽滋养的津门故土。她的回答坦诚而深入，既有对创作的严肃思考，也有对生活的细腻体察。

做谦逊而执着的写小说的手艺人

写作的种子，往往在看似不经意的时刻，便已在心田埋下。对张天翼而言，那种“将来能靠这个吃饭”的笃定，来得比任何人都早。她的文学启蒙并非来自系统的学院训练，本科学的是英文、硕士是古文献学，与“作家”职业看似相去甚远的学术背景，让不少人感到好奇，而她却坚信，创作能力从不依赖特定的专业训练。

“前几天我读围棋大师吴清源的传记，他十岁时迷恋摆棋谱，家长质问他下棋有什么用，将来能靠下棋吃饭吗？吴清源却毫不犹豫地就说，我就靠下棋吃饭。”张天翼笑着讲起这个�事，“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大人对我的就业表达出担忧，我心里却知道，将来我能靠这个吃饭——我觉得我有操纵文字的能力，不管什么时代，人总要点点儿什么，那我就一定有活儿干。”

她用一个个精妙的比喻来解释这种与生俱来的创作本能：“长了翅膀的动物不用上飞行学院，也能扑腾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毕业于军事院校，卡夫卡是法学博士，契诃夫和周树人都是医科生，海明威高中毕业就去当了记者。这些文学史上的巨擘，用各自的生命轨迹证明，文学的殿堂从不对求学路径设限。

然而，从“想写”到“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张天翼也经历过艰苦的求索。她的出道作品是散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写了几年之后，感觉散文实在不能满足我的虚构欲，忍不住在散文里写起故事，于是决心彻底转向小说写作。”她说。

在她的记忆里，童年的阅读是一片驳杂而广阔的天地。普希金诗集、奥运冠军传记、鸳鸯蝴蝶派小说、大案要案侦破实录……囫囵吞下的文字，并未即时生效，却像一颗颗缓释胶囊，在岁月的溶解下，缓缓释放。

这种“缓释”像一道暗流，多年后突然击穿生活的表层，让她领悟到文字背后更深邃的技艺与情感。

除了文学，绘画、雕塑、电影都是她热爱的，她认为艺术是相通的，“画家对某一瞬间的捕捉，对光影、颜色的呈现，雕塑家对姿态动作的设计，电影创作者对故事结构的设置、对人物的刻画，所有这些都是小说作者要狠狠学习的。遗憾的是，我在音乐上不太行，略缺激情与灵感。”

十几岁时，张天翼被罗曼·罗兰澎湃恣肆的文字震撼,“《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名人传》，每一页都像《神奈川冲浪里》，每一段都让人泪盈于眶。”但她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喜欢罗曼·罗兰是有时限的，他是少年心性的特供养料。”

随着写作的深入，真正对她产生影响的，是鲁迅、汪曾祺、福楼拜、福克纳、列夫·托尔斯泰、艾丽丝·门罗、安妮·普鲁、弗兰纳里·奥康纳。“我以读教科书的心态，反复学习这些作家的小说。”他们将他们视为“纸上导师”，在漫长而孤独的写作之路上，这些先行者既是她的领航员，也是她一次次重返的文学原乡。

从纳兰妙殊到张天翼，从网络写作到职业作家，转变的不仅是名字，而且是对写作身份的确认与回归。“纳兰妙殊这个名字起得太早了，上学时在网络上随意写影评、书评，就用这个网名，后来杂志编辑找来约稿，顺势沿用下去。”张天翼笑道,“我一直觉得它有些肤浅，犹豫要不要改。编辑们都反对，认为这个名字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读者群，弃掉太可惜。直到我出版第四本书时，心意已决，因为长久的职业生涯是自己的。”

她用用一个比喻解释改名的初衷：“小说作者的名字，朴实一点为好。作者应当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普通人一样走进人群，在生活深处观察、体悟，而不是靠名字吸引别人注意。沉湎于表面的‘美’难以写好小说，因为生活的真谛往往藏在朴素与真实之中。”从那一刻开始，她选择了做一名谦逊而执着的“写小说的手艺人”。

构建精神的游乐园 细腻呈现女性形象

文学之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对张天翼而言，从早期怪诞绮丽的想象到后来直面现实的冷静，这中间既有时间的沉淀，更是创作者自觉意识的进阶。

早期她以《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张天翼

天津人，现居北京，作家。已出版散文集《粉墨》、小说集《扑火》《如雪如山》、长篇小说《鱼水》等。曾获得朱自清文学奖、蹇石文学奖等奖项。

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异域风情，将其比作自己构建的“精神游乐园”。“二十多岁的年纪，我还没有真正投身生活，天真爱玩的稚气犹存。但江湖走老，胆子走小，我不否定那时的自己，不过现在肯定不会那样肆无忌惮地野着写东西了。”她说。

促使她转身面向现实的，正是对“画鬼容易画人难”的深刻领悟。“写不存在的场域、世间所无的奇人，怎么写都成立；但要写真实的城市，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公交车售票员，写在单位里老实巴交、回家恣意甩脸子打老婆的丈夫，写婚姻中的疲倦室闷和自欺欺人，这些东西真的存在，每个读者都有资格做裁判。”她明白，一一年过去，不能总是原地踏步,“要进阶，要自觉地把书写难度提升上去，要勇敢面对真实的喜怒哀乐。”

于是有了《如雪如山》。这部聚焦女性群像的小说集，七个故事的女主角都叫“liu”。张天翼说：“在这些女人的身体里，都暗藏一块相同的拼图。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长什么样——就像我们的心脏何等重要，但我们毕生也不能亲见它一眼。不过，在跟熟悉或陌生的、不同年龄、身份与际遇，我偶尔会感受到对面那个身体里和我的身体里的‘那一块’，以相同的形状亮着微光。”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共情与理解，穿越年龄、身份与际遇，将女性经验深处的共通之处照亮。

如果说《如雪如山》是一幅女性群像画卷，那么张天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鱼水》则像一件雕塑，她用一把深凿的刻刀，将一位普通工厂女工、中年守寡的母亲“王大鲤”的形象，真实而细腻地呈现出来。张天翼并不认可这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简单的“递进关系”，更愿意称之为“延续”。“《如雪如山》里有一篇讲母女关系的《地上的血》，我觉得犹有未尽之意，就再

写一个长故事《鱼水》。”

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更大。“中短篇小说耗时最长也就半年，写得快的，甚至一周就能完稿。而写一部长篇至少需要一年，要长期承受一桩任务未完成的心理负担，对‘精神肌肉’的要求更高。长篇的语句节奏、修辞密度、故事流速跟短篇也完全不同。短篇的核心往往是一个戏剧性的、顿悟的瞬间，其余细节都在为那个瞬间的爆发做准备和铺垫；而长篇写的是一个长时段的生活过程，餐食与四季，都是过程的组成部分。”她说。

天津工人家庭长大的经历，为张天翼提供了鲜活、真切素材，寻常百姓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的四季更迭，既是长篇体裁的内在要求，也与其自身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在她的笔下，麻酱捞面、熟梨糕，这些实实在在的津味儿食物，让故事变得更加坚实可感。

张天翼认为，在大多数文学叙事中，中老年女性常常是隐身的，她们的欲望、痛苦与挣扎总被家庭生活所掩盖。不过也有特例，比如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主角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小姐；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主角也是五六十岁的女性。“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有高光时刻、精彩的故事。可能正是因为之前作家们写得比较少，所以我写出来也就更有价值吧。”她说。

书名“鱼水”二字意蕴深远，张天翼解读道：“古人以‘如鱼得水’来形容关系融洽，《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得，亦如鱼水。水滋润了鱼、托举了鱼，就像母亲滋养孩子，又像孩子依恋母亲。人类胚胎初期形如小虫，在母腹羊水中孕育成长，正是‘鱼在水中’。这个意象既包含母女之间相依相伴的深情，也暗合生命孕育与成长的本源。”

运用传统的相声技法，包袱一个接一个，现场效果十分火爆。从那时起，每次佟有为和搭档马树春说完一段相声，台下观众就集体喊《黛玉走四方》，不演这段不下台。

可以说，宋勇和佟有为两人为当时茶馆相声的繁荣和复兴贡献了极大的力量。“哈哈笑”相声艺术团隶属天津市群众艺术馆，这也让他们有机会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成为这一艺术现象的“目击证人”。

在相声段子中融入文化观点

宋勇参军后，佟有为一时没找到合适的搭档。河西区文化馆的郑文昆介绍演员胡可瑜与佟有为合作，无心插柳成荫，他俩开创了津味儿小品的先河，深受观众欢迎。

佟有为还参加了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组织的专业演出，与马三立、常宝霆、王毓宝、马超等众多名家同台，让他受益匪浅。佟有为经常去拜访马三立先生，马老也毫无保留地将相声的基本技巧、临场的表演经验以及作为一名合格相声演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一一传授给佟有为，并为他题字“学无止境”以示勉励。佟有为曾对我说，马三立老师给我的指点和教诲让我如醍醐灌顶，我对相声的认知提高了很多。

佟有为跟我说过很多次，一直钟爱马三立的相声，想拜马三立为师。马三立因辈分原因不再再收他，就推荐他拜相声名家刘奎珍为师。遗憾的是，刘先生突然离世，拜师没成功，成为佟有为的遗憾。后来，佟有为为拜在马三立亲传弟子于宝林门下，终于实现了他成为马氏相声传人的夙愿。

天津的城市印记 是她小说的血肉

对张天翼而言，写作不只是一门技艺的操练，更是对生命与困境的凝视。她以白居易的作品举例,“他在《长恨歌》里写帝王妃子之爱，在《卖炭翁》里写底层劳动者之苦，两者在文学价值上不分高下，但我更看重后者。”她认为，文学对边缘者、失败者、被遗忘者的关注更具内在引力,“因为困境永远比顺境更有叙事张力。”

有评论认为，张天翼近期的小说呈现出从想象书写向现实关怀的转变，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日渐丰富与立体。《鱼水》最为评论界称道的是写出了亲情里“往前一步又后退两步”的微妙拉扯。

张天翼说，这种拧巴感，根植于人类亲密关系的本质，也源自中国文化对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亲密关系往往并非单一纯粹的，而会是一种温暖与摩擦并存、理解与误解交织的复杂状态。”她进一步分析,“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语言在传递最深刻、最精妙、最真挚的情感时，是有边界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情感也是如此，亲人之间的情感往往处于一种‘不可言说’的状态，一说出来就容易被局限、被误解。因此大多数人选择‘不说’，希望对方默契于心，自己领悟，但又永远觉得你没真懂、没悟透，两边都委屈、拉扯和拧巴。”

这种创作自觉，使她的文字在锋利与温柔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有读者说，读她的作品“有一种久违的被紧紧抱住的感觉”，但她的文字其实并不回避痛苦，甚至相当冷静。当被问及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写作理想时，她的回答掷地有声：“写得更勇敢，更真诚，更深切，更开阔。”

天津是张天翼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底色，给予她的，远不止相声里的包袱。“城市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千万个衣食住行的细节，是人们对当地的气候、水土、地貌、物产等长期适应的结果。在一道看似普通的饭菜里，往往藏着当地的经纬度、海拔、降水、土壤、历史沿革和居民的选择。”她说,“天津给了我无数可以用来填充故事，让故事变得真切有质感的日常细节，它们都是天津的印记，也是小说必不可少的血肉。”

至于天津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基因，她视之为比麻花、包子、炸糕更珍贵的特产，是“天津人民用以消解一切烦忧的利器”。在书写沉重题材时，这种幽默既是刀剑，也是盾牌。“写《鱼水》时我还是收敛了，没有太多的幽默，在后面的写作中，我会多用。”她也笑着透露了创作计划，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和一部已经准备了七八年但总觉得还没准备好的长篇。“前者希望在明年年初完成，接着就一咬牙一跺脚，把后者写起来。”

对话张天翼 作家与读者的共鸣 是文学最奇妙之处

记者：《鱼水》写了一位母亲的一生。谈谈您是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把普通人的日常转化为打动人心文学作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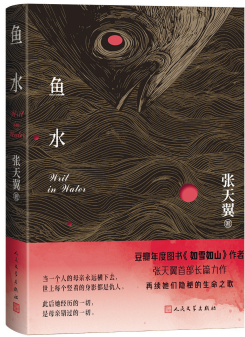
张天翼：《鱼水》这部小说里的母亲叫王大鲤，她名字中的这个“鲤”字，是鱼的一种。现实原型的那位女性邻居称其为“二嫂子”，中年守寡，有个独生子。她的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我也并不了解，但我认为，写作者要自觉地把书写难度提升上去，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为王大鲤注入了血肉，让她变得有了质感，希望能写出普通人内心的坚韧和她身上闪耀的微光。

记者：读者评价读您的小说“有一种被拥抱感”，但您的文字本身又很冷峻。如何在冷静的叙事中，让读者感到温暖？

张天翼：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小说有怎样的“拥抱感”，因为无法作为陌生人去阅读。可能大家在故事里体会到了共鸣吧，这要感谢能够这样沉浸式阅读的读者们，感谢她们张开手臂拥抱了我的文字。这种共鸣，是文学最奇妙的东西。

记者：您自己是否体会过这种“文学的奇妙”？

张天翼：我印象最深的是读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和《啼笑因缘》。我在十四五岁时就读过这两本书，看的是热闹，觉得故事挺好玩儿。但是直到最近我写上一篇小说的时候，忽然想到张恨水处理某些场景的技巧——那种在家长里短中推进情节、在细微处埋设“情感炸弹”的本事，让我突然通



张天翼《鱼水》封面

透了。那种感觉就像，你小的时候吃了一粒胶囊，什么感觉都没有，过了十几年，胶囊壳溶解了，药力缓缓释放出来。这就是“延迟理解”，蓦然回首，发现多年前的阅读为我暗中铺好了路，整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

记者：您如何理解读者和作者的关系？

张天翼：一个作者如果没有读者，创作是无以为继的，不仅作品无人问津，失去出版的机会，而且这个作者存在的意义也会变得恍惚、可疑。幸运的是，我一直很清楚我的读者在哪儿，当我写每一篇小说时，抬起头都能看到读者望着我的眼睛。我知道我是为爱我的人而写的。

(图片由张天翼提供)

讲述·嘛是天津味儿

八十高龄佟有为 相声书法两门抱 说相声的文化人

文 李治邦



佟有为(左)与马树春

编者按：8月1日，天津市民族文化宫上演曲艺名家专场。李伯祥、魏文亮、李金斗、刘俊杰等多位老艺术家轮番献艺。这场演出的幕后推动者，就是佟有为。佟有为生于1946年，师从于宝林，长期与马树春搭档，是从天津茶馆相声舞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的书画作品在圈内也颇受肯定。作家李治邦与佟有为相识四十余载，他写下两人交往过程中的几段故事，今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下午听过一段相声 晚上就能上台表演

我与相声演员佟有为相识四十多年。那时候我还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当曲艺编辑，佟有为送稿子到编辑部，与我可以说是一见如故。1983年，我们一起考入新华职工大学成为同学。佟有为聪明睿智，他的古文基础很扎实，每一次考试前，我都是请教他才得以过关。是我们这一届同学中的佼佼者。

我因为工作的缘故，认识很多相声演员，他们当中有基本功扎实的，也有临场应变能力强的，还有不少聪明的。但是像佟有为这样，既有扎实

的功底、机敏的智慧，又有过目不忘本能的演员，真的为数不多。我听说，他下午听完一段别人说的段子，晚上到另一个剧场，上台就能表演，而且跟原版八九不离十。为了印证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我做了一次测试：与他和他的搭档一起听完一段节目，就见他俩简单对了一遍，然后我们骑自行车到了下一个场地。在台上，他俩使了这段新活，表演得惟妙惟肖，很多包袱运用得比下午别人那场演出还响。我十分佩服，这本事应该说得益于他的智慧，更得益于他对文学的把握和积累。

后来，他去《家庭报》当副总编辑。我劝他别再说相声了，因为办一张报纸是需要费心费力的。他摇头对我说：“我实在舍不得相声，从小就喜欢，这哪里也渗透着我

台上的，始终没有离开。

20世纪70年代，马季先生来天津，组织两场演出，只有四个节目，马季和唐杰忠一场，郝爱民和李文华一场，董湘昆的京东大鼓一场，还有佟有为和宋勇一场。现场相当火爆，马季在后台佟有为说得好，赞美天津是培养相声人才的沃土。可见佟有为在当时就已经很受观众欢迎了。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佟有为本来有一次穿上军装的机会。他和搭档宋勇一起赴京报考空政文工团，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但佟有为是家中独子，父母身体不好，他只能忍痛放弃这大好机会。宋勇无奈，一个人去空政文工团报到，由于没有合适的搭档，只好改为创作员。

转业后，宋勇被分配到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成为我的同事。于宝林先生倡导相声回归茶馆，宋勇积极响应，组织成立“哈哈笑”相声艺术团，佟有为担任了副团长兼艺术总监。

在小剧场实践中，佟有为不断完善自我，创作、演出了很多优质作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由网友东皇太一创作的天津快板《黛玉走四方》。佟有为看到这段作品，觉得题材新鲜，把古典名著《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写进天津快板，让这个古典美人食了人间烟火，让他马上进行改编，表演时巧妙

佟马组合配合默契 钻研书法遍访名师

按照佟有为对我说的：“我不是简单地模仿，我是在做一种潜意识里的创新。”2004年，在首届中国网络相声大赛上，他凭借《奥运梦》斩获金奖。中国曲艺家协会为“佟马组合”（佟有为、马树春）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举办了专场演出。佟有为也荣获了“百姓最喜爱的相声艺术家”荣誉称号。

这里还要说说佟有为的搭档马树春。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曾在北辰区文化馆工作。他捧哏时火候得当，把多数包袱都让给佟有为，但也给自己留下发挥的空间。他与佟有为合作四十多年，被称作“黄金搭档”。

我说佟有为是文人相声，还因为他是一位书法家。有人这样评价佟有为：“舞台上，他是津门家喻户晓的相声名家，嬉笑间，藏世间百态；书案前，他是深耕笔墨四十余载的文人书家，挥毫处，见传统文脉。一俗一雅，一动一静，两种艺术在他身上相融共生。”佟有为遍临各家名帖，从王羲之、王献之入手，兼临米芾、赵孟頫、王铎、文徵明等名家，以行草见长，同时将隶书与简帛结合，相得益彰。他悉心好学，拜在书画大家王学仲和慕凌飞门下。其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展览并在报刊发表，被众多书画爱好者收藏。

佟有为不仅注重自身艺术的提高，同时也在相声和书法的教育方面作出了努力，收了多名学生，授业解惑。他对我说，我会让徒弟超过我。他的语气很真诚，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图片由马树春提供)